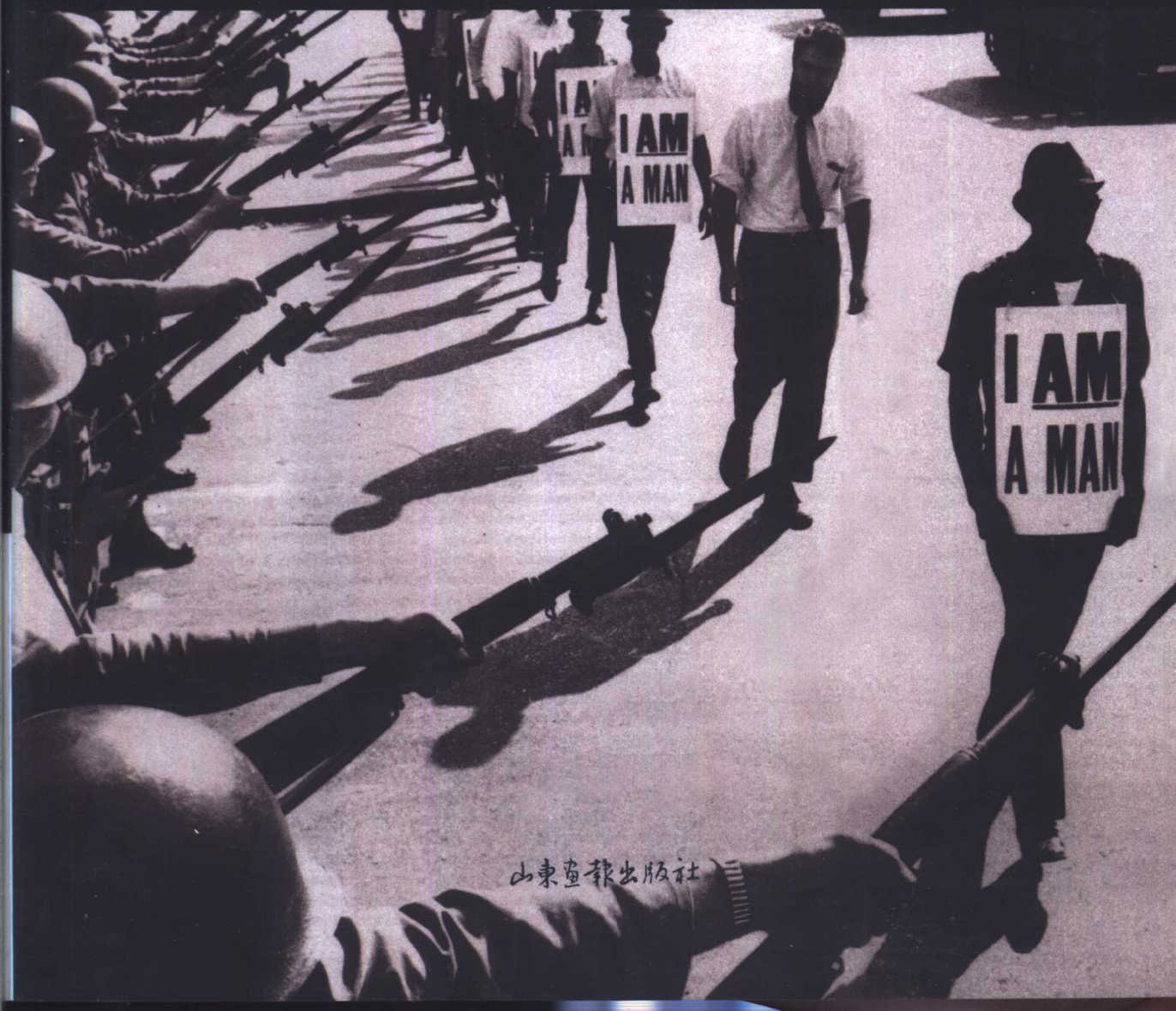


1968^年

反叛的年代

塔里克·阿里 苏珊·沃特金斯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1968^年 反叛的年代

塔里克·阿里 苏珊·沃特金斯 著
范昌龙 李宏 王彦兴 李尚杰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1968年:反叛的年代 / (英) 塔里克·阿里, 苏珊·沃特金斯著
范昌龙等译.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1

ISBN 7-80603-705-5

I. 1... II. ①阿... ②沃... ③范... III. 政治事件
— 世界 — 1968 IV. D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6634 号

责任编辑 傅光中

装帧设计 宋晓明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60055 — 5420

市场部 (0531) 2053182 (传真) 2906847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webmaster@www.sd-pictorial.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70 × 228 毫米

17.75 印张 156 幅图 20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1968年1月哈瓦那发行的切·格瓦拉的招贴画原件。

引 言

“质疑权威的年代”

无论是作为悲剧，还是作为喜剧，历史都不会重演；但它自有其不变的唱腔韵律。30年后的今天仍有1968年的回响。重读有关1996—1997年法国罢工和学潮的文字，30年前让法国瘫痪的那更为激烈的一幕幕便浮现在人们眼前。劳伦特·卡比拉（Laurent Kabila）领导的横跨刚果的胜利大游行和西方支持的对暴君莫布托（Mobutu）不光彩的空运提醒人们：民众的激愤仍能以组建解放军的形式表现出来。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诗人托马斯·麦克格拉斯（Thomas McGrath）在他的‘致假想的朋友的一封信’中写到了那些讥笑过去的人。他当时写的是30年代，但今天看来对60年代也很适用：

狂妄的言论，易被人笑为痴呆，
不解其中味，你从来就不明白！
真实的
是那份慷慨与期待，
坦荡而真诚地
梦想创造美好世界。

秋去秋又来，今夜的秋凉
是否比古人多了份凄凉？
星光下，寒霜

覆盖在
我那庭院的残垣断壁上，
覆盖在
我希望和韶华的荒冢上。

眼前寒冷的大街上
我听得见
追名逐利者的叫嚷
和名利那愤怒的回响
……

经历过1968年的人，无论在政治分野上属于哪一边，都将不会忘记这一年。这一年在每一个大陆都标志着整个一代人。早在“全球化”成为自由市场的政治文化中的时髦语之前，作为要永远改变人类生活状况的斗争的一部分，1968年的事件就已使政治激进主义全球化了。它也是希望的年代，当有些人感到权利被剥夺但又不得不认命时，世上受苦的人——那些一无所有者，却开始恢复了他们的权利。

有关60年代的性、吸毒和摇滚的书比比皆是。迷幻的60年代的印象（尤其在英国）已经模糊了这一时期的政治。我们生活在认为乌托邦是不着边际的幻想的时代，生活在被恬不知耻的机会主义所窒息的文化氛围之中。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只专注于历史，只注重1968年实际发生的全球现象。

1968年是创造新世界的尝试，是政治、文化和个人关系的新起点。我们认为不能以“成败”或物质财富论英雄，而应以人道主义的理想抱负：经济应该重组以服务于大众而非少数人，社会主义的命运与真正的自由和有实际意义的民主密不可分。要使世界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就必须重建一个新世界。

1968年的英国像现在一样，也有一个工党政府。工党政府的全面失败导致了激进主义，导致数万人脱离工党，而拒绝加入它的人则更多。以下摘自经济学家肖恩·哲瓦西(Sean Gervasi)登在1968年7月11日的《黑侏儒》(Black Dwarf)上的一段评论，显然像是现代话语，只是福利国家的任何扩大，都被新工党视为极左的凯恩斯主义和“老工党”的愚蠢行为。有些事情已然发生了变化。

“工党的新不列颠蓝图又是什么呢？首先，应该说新不列颠与社会主义虽有经济增长率提高和福利国家有所扩大的浮华，但它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形

态。”

总部设在伦敦的《黑侏儒》第一期于1968年6月1日发行，本书将从中摘引新闻资料。当时，五月风暴的巴黎街头伤痕累累，它所引发的共振让全世界独裁主义的领导人大大为震惊。《黑侏儒》取名于19世纪早期的宪章派刊物，既含讽刺又喻报道民情民意之义，存世两年。它是先锋派青睐的表达手段，也是新左派的心声。更确切地讲，编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与以下诸君——他们是剧作家大卫·默尔瑟(David Mercer)、戏剧导演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诗人克里斯托弗·朗格(Christopher Logue)和阿德瑞恩·米歇尔(Adrian Mitchell)、女权主义者谢拉·罗伯特汉姆(Sheila Rowbotham)、弗雷德·哈利代(Fred Halliday)、克莱夫·古德温(Clive Goodwin)和我——的卓见结合了起来。使我们团结在一起的，首先是我们都相信质疑权威的时代到来了。政治的、社会的、性的，所有的清规戒律，都该受到挑战并予以打破的时候到来了。解放的观念传遍全球，速度之快让人吃惊。亚洲一个贫穷的农业国组建的一支军队可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进行对抗，战况鼓舞人心。越南大卫让美国歌利亚尝到了厉害。曾在1954年打败法军的传奇人物、越南军司令武元甲(Vo Nguyen Giap)当时曾镇定自若地说，美国也会是同样的下场。他预言美国将输掉这场战争：

“我们的人民为我们的国家利益而战，也是为社会主义和世界上争取解放的其他民族而战。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个靠氢弹虚张声势的大国，正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无论它的军事和经济潜力多么巨大，都不可能摧毁一个为独立而战的民族的意志……”

“为什么美国认为它会胜利呢？它在我们的国家部署了庞大的战争机器。威斯特摩兰(Westmoreland)将军有办法让美国的远征军从2万人激增至五万多人，但除了一线胜利的希望，他并无其他礼物回报华盛顿。美国佬把赢得战争的希望建立在他们的优势兵力、强大武器、大量美钞和他们投掷的一吨吨炸弹上。



《黑侏儒》第一期(1968年6月)
反映着时代精神。

“当发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时，他们只会指责他们的将军们试图用数学解决问题，如在力量平衡的问题上，而不会像越南人那样使用三角法战略。那是正义的人民战争可以利用的再简单不过的战略，但他们永远也不会明白。”

越南人胜利的意义直接而且巨大。“我们要战斗，我们会胜利：巴黎、伦敦、罗马、柏林。”1968年5月我为《黑侏儒》封面题写的这句话可谓是片面的典型。布拉格、华沙、德累斯顿和莫斯科又会怎样？越南的例子向所有人表明：没有一个大国是不可战胜的。它们都是纸老虎。

另一个鼓舞是厄内斯特·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²，拉丁美洲的革命烈士，60年代惟一的政治偶像，是今天仍能激起人们兴趣的人物。1997年，他被中央情报局杀害30周年之际，大量有关他的图书仍在世界各地出版。

格瓦拉是一位阿根廷的内科医生。他成了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³的同志和密友，并加入了一支决心解放古巴的游击小分队。他们要把古巴从华盛顿选定的黑手党独裁统治下的妓院，变成全美洲的革命熔炉。

1960年，卡斯特罗、格瓦拉和他们的同志们已处于巨大胜利的前夜。古巴的农民、工人、学生和由医生、律师组成的职业界决定支持革命。古巴撵走了美国佬。一夜之间，大胡子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成了拉丁美洲的英雄。

切·格瓦拉是古巴革命主要的军事战略家。作为游击队的司令员，他在不得人心的决策面前从不畏缩，但是古巴革命胜利后，他的兴趣却转向了对社会和经济的研究。

越南人民的斗争依然让这位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寝食不安。1966年，他在哈瓦那三大洲的代表大会上，呼吁“把越南一分为二为三或更多”，以孤立、击败五角大楼的军队。那时，为开展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斗争，他已经离开了古巴。尽管他的确做过当地游击队领导人劳伦特·卡比拉的鼓动工作，但他在刚果的努力并未取得成功。

在玻利维亚——依照任何标准它都是误判的审判地，他试图重复制古巴模式，在丛林中发动农民。他的小队人马被孤立并最终遭到围困。格瓦拉被活捉；中央情报局特工下令枪杀了他。

格瓦拉的殉难使人们忘却了他的失败。他的遗容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漂亮[约翰·伯格（John Berger）誉之为曼特尼亚（Mantegna）⁴的基督]。他成了世界上千百万人的行为榜样，成了一名传奇英雄。为代表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民而进行斗争，他毅然放弃了他在古巴享有的权力和待遇：这一点使得他更加与众不同。

有一篇用诗歌形式写就的遗嘱寄给了他的妻子阿莱达 (Aleida)，诗的名子叫《乘风破浪》。这是一篇感人的悼文，悼念一位音容笑貌让敌人和朋友都难以忘怀的人：

我的签名在这诗（《乘风破浪》）上
我送你六句片语铿锵
多么想看你一眼，
（像受伤的鸟儿）柔情无限

多么牵挂你，怕你水温时忘了水深
多么希望我的诗行为你点亮黑屋的灯
长夜漫漫陪伴你的是我的旧顶针
我愿再把我们两个儿子的照片遗赠

我愿把一直伴我的这支枪内
最美的一颗子弹送给你
还有我对孩子们难以忘却的记忆
（总是那么深切，可又总是隐而不见）
孩儿是你我的血脉
是我生命的延续

我要把他们交给革命（幸福而坚定）
这是我们举家团圆的最大的力量源泉。

切·格瓦拉希望创造新的世界和新的国家形态，但西方许多人仇视他这样的思想和活动。为什么国家要管理个人的生活？为什么同性恋长期以来被认为非法？为什么堕胎直到1967年才被宣布为合法？为什么年轻人就该被迫以特定的方式着装？为什么妇女不能享有相同的报酬和地位？谁决定了公共住房的建筑设计？（为什么不是由住房子的人来决定？）为什么全世界的官僚政权对普通人的疾苦和生活都漠不关心？为什么大学生不得不在拥挤的环境中学习和生活？为什么第三世界要屈服于第一世界的长期凌辱？这些问题，在每一个地方

都被以不同的方式提了出来。传统的政治家们未能就这些问题做出适当的反应，因而导致了1968年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发生。

在那个年代，各地动荡的激烈程度是不一样的。在英国，性、吸毒、摇滚与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 Square）上群众性的反越战示威，都想引起人们的关注。享乐主义的潮流与革命的政治洪流亦成犄角之势，尽管两者偶尔的融合是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的特点。其他地方则是政治问题唱主角。尽管伦敦有国王路（King's Road）和卡那比大街（Canaby Street），但具有“明星”资格的还得数巴黎，因为那儿有个拉丁区。

回首往事，30年前的那份宽容、希望和乐观无不让人动容。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相信，让所有人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是可能的。这些思想的力量迫使政客们必须把改革与镇压结合起来以应对局面，但两者如何结合在世界各地的差异则很大。

1968年开始时，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们都一定程度上沾沾自喜地统治着他们的国家，这是可以理解的。此前的20年，他们成功地建立了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东方就没有这样太平了：1953年在东柏林、1956年在布达佩斯爆发了起义，波兰在1957年爆发了群众性的示威游行。正是这些事变使得莫斯科的老人们对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感到特别紧张。

早期的这些起义增加了西方的优越感和自满情绪。西方的当权者认为，那样的事不会在他们这里发生。对大多数的公民而言，社会民主党治下的社会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满意。

上一次革命浪潮波及整个欧洲的时候是1848年。那一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因害怕巴黎暴民的不良习惯传播到布鲁塞尔而病倒，他写信给他的侄女、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巴黎恐怖事件之后，我的身体状况极为不好。我们会变成什么人，只有上帝知道；在我国发动革命的力量会是巨大的，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有穷人和坏人，所以革命就有可能成功。”

几个月以后，维多利亚这样回复他：

“自从2月24日以来，我对存在的一切都有一种不确定感，这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当一个人想到自己的孩子们，想到他们的教育，他们的未来——并且为他们祈祷时，我总在考虑并想对自己说，‘孩子要任其发展。无论将来的社会地位高低，只要他们自己能适应就行。’过去我从来不想这个问题，但是

现在我却总在想。”

1968年的欧洲在主要方面已不同于1848年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了社会动荡，但是1945年在罗斯福、斯大林和邱吉尔之间的雅尔塔交易把欧洲大陆划分成不同的势力范围：斯大林统治的东方和北约统治的西方。和平得以维护且西方政府对充分就业和建设福利国家的政策坚定不移。这就是为什么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以前，激进主义左派的动力来源于古巴、越南和中国的原因。二十多年来，欧洲的左派力量第一次发现，他们一直欣赏的远方其他人陆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暴，突然有一天也在自家的门前发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的改革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值。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改革直接导致了教育界文化觉悟的提高，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个新的中间层。1967年美国有600万大学生，西欧有250万，日本有150万。1968年在校的这一代学生既不知道何为失业，也不知道什么叫失败。他们对他们的上一辈——他们的父母——很挑剔。他们的父辈未能战胜失业，而且让法西斯主义得了势。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学生们公开反叛自己的父母，因为父母曾集体屈从于墨索里尼、希特勒和东条英机的法西斯主义。世界各地的学生见到的是：一个不能实现诺言和满足他们精神和社会需要的政府，一个不愿接受任何严肃批评的政治制度，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对一个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残酷的战争。

这是一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之后不久出生的学生组成的新的社会阶层，他们所具有的道德良心和政治敏感很快在各大洲的每一个首都的街道上迸发出来。

1968年作为二战后独特的一个年份的原因正在于此。越南人民抵抗美国战争机器所取得的胜利，法国的“五月风暴”和苏联坦克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的摧毁，代表了世界范围内三个主要阶段的斗争。这些事件都对历史产生了影响。

在越南的失败，使得美国不再愿意直接干预其他洲的事务。此后它更喜欢依靠当地人做代表、雇佣同盟军和利用联合国的招牌以及先进技术来代替过去的直接干预。

“五月风暴”现在仍然是法国人集体的记忆。在1996—1997年的学生占领和工人罢工的运动大潮中，这一事实被法国媒体的每一位评论员提及。甚至连那些性情暴戾、曲解是非的观察家们想到最初的这些事件也会露出微笑。这就

是历史的韵律。

俄国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羞辱其改革派领导人的决定，敲响了苏维埃制度及其东欧附属国体系的丧钟。如果1968年在莫斯科执掌权柄的是戈尔巴乔夫而非勃列日涅夫，那么“布拉格之春”的花蕾很可能就在这年的盛夏开遍整个东欧。

现如今，一些当年参加者的习惯做法是称这些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为建立乌托邦的空想；善意的讽刺称他们是体面而怀旧的自由党人，恶意的讽刺则称他们是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后期让人不愉快的步兵或野心家不顾一切的趋炎附势之举，或者用“冲动”二字把整个时期一带而过。作幸福状地插入一句概括性的话“60年代的政治不行”，则是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时髦评论。

这样的评论者不仅仅局限于摆出一副极左的样子，而且暗中勾心斗角，谁都说自己是继承了列宁、托洛茨基或毛泽东的理论，要不就把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的学生运动中的某些派别的决定挑出来作为恐怖行动的开始，借助恐怖行动能使大多数人认识到帝国主义的罪恶。尽管那个时代充斥了各种各样的暴行，但批评60年代的人不只是批评这些。他们的矛头直指那些挑战美国强大战争机器的人士。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越南战争美国应该而且当时就应该赢的。

近来批评家批评的另一个主要对象是取得重要成果且载入史册的运动，即性政治领域。妇女解放，同性恋的合法化、“正常化”的斗争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已经取得的成果是相当巨大的，现在这些已成为二十几岁的这代人常识的一部分。

60年代的有些方面需要而且也应该受到批评。对国家和所有相关著作无知的无政府主义并非只出现在左派的身上，也反映在右派身上。从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向乌托邦式的资本主义的转变并不困难。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利用人们对政府不加掩饰的偏见，宣称只有基于自由市场创造的条件，那个真正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60年代那并不严谨的、空想的理论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海伊克(Hayek)⁵和弗里德曼(Friedman)⁶的追随者手中变成了威力致命的毒素。信奉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人民委员们原来与他们国家的前辈们一样平庸、官僚。现代资本主义采用的“休克疗法”不仅损害了前苏联、东欧数百万普通群众的生活，而且摧毁了这些社会的文化。

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并非是年轻人惟一热衷的哲学。1968年的革命动乱重新唤起了整个一代人对俄国革命早期岁月的记忆。对于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每一个小团体都有自己的版本。这些团体办的许多左翼报纸都认为自己是列宁《星火》(Iskra)的当今版。今天用最辛辣的语言说列宁是魔鬼的那些人当中，在那时有些曾是最奴颜婢膝、最阿谀奉承的列宁主义者。需要补充的是，那些希望自己的周刊成为新《星火》的人，都急不可捺地去听鲍勃·狄伦(Bob Dylan)⁷和“滚石乐队”的歌，同时又急不可捺地去看戈达德(Godard)⁸的电影和跟踪晚间电视新闻中有关越南情况的最新报道。差不多可以说，当时的每一个激进主义分子都过着双重人格的生活。

这种通过回溯、从过去寻求希望的做法无异于部分地放弃了提出创见的责任。每一代革命者都会从历史的成功中寻求榜样。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动力问题就深深困扰过俄国革命者；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⁹、丹东(Danton)¹⁰和马拉(Marat)¹¹并不是不清楚17世纪英国革命形成的过程。正是英国教会了世界如何把国王的头颅砍下。

尽管回溯是可以理解的，但它的确容易使斗争的形式和手段浪漫化。有趣的是：学生反抗运动初期，即“言论自由运动”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Berkeley)¹²开始时，人们普遍感到愤怒的对象是计算机；理由是：“不可告人的东西都藏在计算机里”；反计算机的思想不是要求把这一技术对所有人开放，而是建议将它摧毁。

德国诗人、文化理论家汉斯·马格那斯·恩贞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当时注意到了这一倾向，他在1969年这样写道：

“巴黎‘五月风暴’期间回归古老的生产方式的特点尤为明显。在工人中进行鼓动宣传时，学生们用艺术学校的手动操作的印刷机而不是摩登的胶印技术印刷海报。政治标语也是手画的；用模版印刷肯定可以一下子全部印出来，但这会妨碍作者们富有想像力的创造。他们缺乏战略性地适度使用最先进的媒体的能力。造反派攻占的不是无线电台，而是有着悠久传统的欧迪翁剧场(the Odeon Theatre)。”

恩贞斯伯格的话并无不当之处，但他认为，走向保守的传统主义的标志其实是与第三世界的农民，主要是组成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员的农民站在一起的。人们对技术抱有明显的敌视态度，因为我们每晚都能从电视屏幕上看见数以百计的炸弹被投掷下来，它们炸毁了南越农民的村庄。有人认为，为了使

用而不是为了利润的生产，都必须以手工艺为基础。这正是巴黎艺术学校制作的令人称奇的海报的由来；这些海报后来自然成了宝贝，在全世界被收藏、复制和买卖。初版都到了收藏家的手中。不过，德国诗人总的说来是正确的。法国学生和工人在1968年五六月间应该占领无线电台，向全体人民广播他们的主张。

本书仅仅是1968年的政治日历，它一五一十地报道和描述了这一年的事件。每一个月在世界的某个地方都有事件爆发。事实上，巴基斯坦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学生运动触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起义，导致军事独裁者被推翻和国家的最终分裂；原国家存在的合法性连其缔造者都对它表示出了怀疑。

对于今天读这段历史的人们来说，那时的世界似乎是一个沉沦的大陆。然而令我们难以相信的是，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希望已是一去不复返了；自我反省和利己主义已取代了人人平等的信仰。人类仍然有能力使世界再来一次这样的变化，但本世纪最后几年取得胜利的这种制度，是宁愿使我们成为无用之人，也不会放弃其特权的。

塔里克·阿里

1998年1月

〔注 释〕

1 威斯特摩兰 (Westmoreland, William Childs, 1914—) 美国陆军上将 (1964)，曾任西点军校校长 (1960—1963)，在越南战争中任美军司令 (1964—1968)，后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1968—1972)。

2 厄内斯特·切·格瓦拉 (Ernesto ‘Che’ Guevara, 1928—1967)，生于阿根廷的古巴革命领导人之一、F. Castro的得力助手、游击战专家，曾在古巴新政府任要职 (1959—1965)，后到扎伊尔、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受伤被俘，遭杀害。“Che”是个惊叹词，在阿根廷是朋友或亲人之间用来打招呼的用语。古巴人用这个绰号称呼参加他们事业的格瓦拉。卡斯特罗说：“这个名字后来出了名，成了一个象征。”

3 菲德尔·卡斯特罗 (Fidel Castro, 1926—)，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1959年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后，曾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

4 安德里亚·曼特尼亚 (Andrea Mantegna, 1431—1506)，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巴杜亚画派画家，开创仰视透视法及天顶画装饰画风，主要作品有《恺撒的胜利》、都卡莱宫的装饰壁画《婚礼厅》等。

5 海伊克(Hayek,Friedrich August von,1899—1992),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经济学家,反对凯恩斯经济学,倡导自由市场经济。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6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美国经济学家,货币主义学说创始人,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物价水平和经济活动变动的根本原因。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81—1989年担任里根总统政策顾问。

7 鲍勃·狄伦(Bob Dylan,1941—),美国歌手和歌曲作者,20世纪60年代城市民谣复兴运动的主角。以创作和演唱政治及抗议歌曲闻名。主要唱片有Highway 61 Revisited(1965)和Blood on the Track(1975)。

8 戈达德(Jean-Luc Godard,1930—),法国电影导演,以电影革新著称。其执导的影片有Breathless(1960),Alphaville(1965)和Wind from the East(1969)等。

9 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领导雅各宾派政府—公安委员会(1793—1794),平定反革命政变,镇压忿激派和阿贝尔派,在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中被逮捕处死。

10 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1759—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雅各宾派领袖之一,选入国民公会后试图调和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后因反对雅各宾派革命政府的各项政策而被处死。

11 马拉(Jean Paul Marat,1743—179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之一,国民公会代表,创办《人民之友报》(1789),参与领导推翻吉伦特派的起义(1793)和建立雅各宾派专政的活动,后被刺杀身亡。

12 伯克利(Berkeley),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城市。





目录

引言	1
一月	1
二月	27
三月	49
四月	71
五月	93
六月	121
七月	141
八月	161
九月	181
十月	201
十一月	221
十二月	239
跋	255
参考资料	262
图片来源	264
致谢	265